



●亞太和平博物館
「讀懂歷史，才能將對苦難的銘記轉化為對正義的守護」

「跨族裔的協作實踐，推動了共同正義觀的形成」

「要讓年輕人真正走進並傳播這段歷史，關鍵在於從人性共鳴切入」

在加拿大，有這樣一群華裔，他們持續二十餘年奔走呼籲，敦促教育部門修訂教材、拍攝紀錄片、出版書籍等，多角度向西方社會呈現歷史真相。他們推動全球第一座以英語系統展示亞洲二戰歷史的亞太和平博物館在多倫多落地。

多倫多亞太和平教育中心行政總監劉美玲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分享二十多年來，華裔群體在加拿大推動包括南京大屠殺等在內的真實歷史呈現的點滴。她強調了歷史教育的重要性：唯有讓更多人通過教育讀懂歷史，才能將對苦難的銘記轉化為對正義的守護。「將正確的歷史納入系統教育中是最為有影響力的模式，正確的歷史教育是和平的基石。我們尤其重視年輕人的參與，鼓勵、引導他們一同尋找歷史與現實的連接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 圖：受訪者供圖



●加拿大學生在亞太和平博物館內了解亞洲二戰歷史。

加拿大華裔推動教材修訂及建博物館 在西方講述亞洲二戰史 正確的歷史教育是和平基石

「我從香港移居加拿大快四十年時間，超過一半時間，都在做歷史相關的工作。」受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書影響，劉美玲2004年加入加拿大多倫多二戰史實維護會(簡稱「史維會」，現為亞太和平教育中心)，2005年開始做全職義工。此後二十年，她和創辦了多倫多史維會的王裕佳醫生等人一同，致力於在加拿大推動亞洲二戰歷史的教育工作。

「二戰不僅僅是在歐洲發生，亞洲戰場的暴行奪走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然而這段歷史在西方社會乃至許多亞洲地區，長期處於被忽略的狀態。認知的缺失讓大量戰爭暴行淡出公眾視野。加害者在如山鐵證前逍遙法外，甚至試圖篡改歷史。」劉美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推動將正確的歷史內容納入當地的教育系統中，是最有長遠意義的安排，「從日本方面的反應看，右翼最害怕的也是這一個做法。」

到歷史發生地與倖存者交流

從2004年開始，史維會就安排帶領加拿大當地教師到中國參觀相關博物館，與學者和倖存者面對面交流，行程安排包括南京、北京、上海、哈爾濱等地。「讓教育工作者到歷史發生的地方去，是一個切入教育系統的起點。沒有什麼能夠比現場所見的真實更具衝擊力。」

此後，他們繼續通過工作坊、講座等形式，通過推動歷史研究內容與社區、學校的連結，以嚴謹客觀的歷史求證，來進一步獲得官方與社會的認可。

推安大略省將南京大屠殺列入課本

2007年，團隊籌款拍攝的紀錄電影《張純如：南京大屠殺》(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增進了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並推動安大略省教育廳將南京大屠殺歷史列入課本。加拿大國會也在同一年通過議案，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受害者道歉。

四千呎展陳 呈現亞洲戰場苦難

經過之後幾年的教育工作推動，一個更遠景的想法，在大家心中逐漸成形：我們需要一個能夠系統展示亞洲二戰歷史的實體依託。劉美玲等人先後前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等地考察、搜集整理史料及相關內容的版權等。「經費是一個方面的難

點，讓歷史準確呈現，是更大的挑戰。」

經過7年的籌備努力，展陳面積約4,000呎的亞太和平博物館於2024年在多倫多開館。以「戰爭前因」「戰爭暴行」「戰後反思」為核心框架，分為「日本軍隊性奴隸」「生化戰與人體實驗」「亞洲二戰與加拿大」「戰後公義」等十個主題展廳。「大屠殺」展廳聚焦南京大屠殺，同時也展出新加坡「肅清行動」、馬尼拉大屠殺等反人道暴行的罪證，完整呈現亞洲戰場苦難。

「如果僅僅只展示南京大屠殺的部分，對於非華裔人群而言，很難找到價值共識，因此從一開始，我們的策展就是以『二戰在亞洲』的思路進行。」

博物館敘事以「證言+場景+故事」為框架。通過受害者與加害者證言，搭配圖片及場景設計，讓參觀者感受當事人的痛苦、掙扎與苦難。「考慮到以教育提供為主要出發點，受眾的年齡和認知以及相關法律的規定，圖片等內容的呈現不宜過於血腥，在可行的範圍內，我們做了最大努力講清歷史。」

志願者含非亞裔及日裔群體

目前，博物館有8名全職員工，劉美玲與亞太和平教育中心副總監鄭健齡以志願者的形式參與日常，王裕佳醫生則協助籌款工作。劉美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博物館志願者中包含非亞裔群體，以及日裔群體。他們的視角雖受成長背景影響，但在博物館引導下，通過探究史料、分辨信息，逐漸形成了對歷史的全面認知。

這種跨族裔的協作實踐，推動了共同正義觀的形成。亞洲二戰是全人類的浩劫，受害者涵蓋中國、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多國。在這樣的主題面前，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人都能達成價值共識。

籌備數博館 進一步提升傳播速度

「博物館成為當地學校歷史教育的一個很好去處，除了來到這裏聽講解，我們也會定期以工作坊等形式，分享一些研究成果。」劉美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團隊正加緊推進數字博物館的籌備，計劃在2027年3月前完成，「數字化呈現能夠讓更多教育工作者在我們這裏，獲得有用的資訊，也能吸引更多不同族裔的年輕人參與，相信傳播的速度也能進一步提升。」

消逝的是一段真實歷史



●2006年夏天，王裕佳和劉美玲帶領加拿大當地中學的老師來到南京，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網上圖片



●2006年赴南京採訪拍攝期間，劉美玲(右)與當時77歲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中)和女兒在一起。1937年冬，夏淑琴一家九口人中的七位被日軍殘忍殺害。如今，夏淑琴已經96歲，她一直在等待日本政府的道歉。

特稿 | 常志強、夏淑琴、秦傑、雷桂英、倪翠萍……

12月13日，香港大學王廢武講堂，大屏幕上正播放《張純如：南京大屠殺》。在劉美玲眼前閃現的這些熟悉的面孔，大多數已抱憾離開人世，沒有等來日本的道歉。

二十年前，劉美玲帶着加拿大攝影組前往中國、日本和美國等地，拍攝這部劇情紀錄電影。「我們最初的想法，是希望拍攝一部能夠在加拿大用作二戰歷史教學題材的影片。」在中國拍攝的過程中，劉美玲身兼監製、統籌和翻譯，說着並不熟練的普通話進行各種溝通和銜接。「我們希望能將張純如走訪過的對象，都盡可能地拍攝訪問。」

腦退化倖存者 只忘不了南京痛

劉美玲表示，選擇比爾·斯潘克(Bill Spahic)和安妮·皮克(Anne Pick)兩位加拿大人出任導演和製片人，是為了更好地從西方視角來詮釋歷史。「開始確實也有一些擔心，他們會如何解讀這段亞洲二戰歷史。」拍攝前，導演和製片人花了大量時間翻閱歷史資料，「他們得出了和我們一樣的

結論：亞洲二戰是全人類的浩劫，日本軍國主義惡行需要讓更多人了解。」

劉美玲永遠無法忘記，一位已經患上腦退化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已經記不清晚年發生的事，卻依然能夠講述大屠殺的痛苦記憶，講述時眼中泛着淚花。擔任翻譯的劉美玲再也無法抑制情感，與安妮·皮克抱頭痛哭。「在最後的影片中，導演只留下了訪問者的影像，以避免有心人士以疾病為理由質疑訪問的可信度。但是我們都無法忘記，這令人觸動的一刻。」

日本軍國主義幽靈從未消失

在拍攝安排中，加拿大團隊建議加入對日本右翼作家加瀨英明(Kase Hideaki)的直接訪問，以讓整體敘事更加有說服力。

加瀨英明：We did not commit any massacre there in 1937—a complete fabrication by the Chinese. (1937年我們沒有在南京實施大屠殺，完全是中國人虛構的)

導演：None? (沒有?)

導演：You don't think eyewitness testimonies, Japanese soldiers' diaries and film footage...? (你不承認目擊證人的證詞、日本軍人的日記還有那些影片?)

加瀨英明：Oh, those film footage were made up by the Nationalist Chinese Propaganda Ministry. (哦，那些影片是虛構的，國民黨宣傳部虛構的)

「兩位導演非常堅持，我們見到，這一段訪問非常重要。觀眾能夠直觀了解到，日本的軍國主義幽靈從未消失，永遠值得我們警惕。」

這部時長103分鐘的影片，被翻譯成7種語言。多倫多教育局通過決議，為教育局轄下的每所中學訂購影片光碟，供歷史老師教學使用。

拍攝完成後，劉美玲還曾多次前往南京。「倖存者不斷離世，對我們而言，消逝的不僅是一個名字、一個人，而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劉美玲說，每一位倖存者的離去，都是對歷史記錄更緊迫的鞭策。

至2025年10月，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照片牆上的燈，僅剩24盞。



●2018年7月，劉漢耀(後左)再次前往加拿大，與王裕佳醫生(前左)和劉美玲一道前往探望佐治·麥當勞(George MacDonell)(前右)。

尋訪香港保衛戰老兵 實習計劃連接跨代情誼

2014年，在香港大學讀書的劉漢耀前往亞太和平教育中心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實習。「我是第一屆DSE考生，當時我們對中國歷史的學習內容，確實是非常少的。」在那一年的實習中，劉漢耀結識了當時92歲的加拿大傳奇老兵佐治·麥當勞(George MacDonell)，第一次系統了解了香港保衛戰，對「里斯本丸」號的歷史有了認識。

1940年，佐治17歲時響應加國呼籲參軍，在Wolseley Barracks受訓作為步兵，幾個月後他前往魁北克市，加入新組建的加拿大皇家來福槍軍團。1941年11月，部隊抵達香港協防。根據史料記載，在香港保衛戰中，加拿大援軍為數

1,975人，當中290人戰死，493人受傷。另外264人在變成戰俘後因飢餓、虐待及疾病喪生。佐治成為戰俘後，曾經被送到橫濱船塢及大橋煤礦勞動。他目睹同胞進行敵後破壞，燒毀日軍艦船圖紙。佐治身高超過6尺，但由於營養不良及強制勞動，戰爭結束時體重下降至110磅。

「若不記歷史，受害人便是我們」

此後每一年，劉漢耀都會與佐治通電話。2018年，他再次前往加拿大探望佐治·麥當勞，「還能再見到他，我覺得真的非常幸運。」直到2023年的復活節假期，這是劉漢耀最後一次與佐治通電話。兩日後，佐治百歲高齡離世。「如果不是參

與實習，我想我可能沒有機會能認識佐治，接觸到這段歷史。」如今已經是執業律師的劉漢耀說，「如果不記得這些歷史，受害人便是我們。」

劉美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亞太和平教育中心與香港、巴西、斯里蘭卡等地的大學有學生實習合作計劃，「要讓年輕人真正走進並傳播這段歷史，關鍵在於從人性共鳴切入。」各界應為年輕人提供參與機會，讓他們認識到，自己能為歷史傳承、世界和平帶來切實改變。

「在我讀中學的年代，中國歷史只讀到1911年，在Tony(劉漢耀)讀書的時候，他們依然覺得中史內容學得不多。」在她看來，在香港進一步推動歷史教育，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